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二辑

DANGDAI ZHONGGUO TUSHUGUANXUE YANJIU WENKU

LiShi WenXian YanJiu

历史文献研究

王世伟/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

历史文献研究

王世伟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研究/王世伟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10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二辑)

ISBN 978 - 7 - 5013 - 3749 - 1

I. 历… II. 王… III. 历史—文献—研究—中国—文集
IV. 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9542 号

书名 历史文献研究

著者 王世伟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75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749 - 1/G · 771

定价 48.00 元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 主编:吴慰慈 陈源蒸
- 编委:陈源蒸 中宣部出版局研究馆员
- 郭又陵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 李万健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审
-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
- 倪 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彭斐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谭祥金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
- 吴慰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徐引篪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总 序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应用、共同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文集。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正好是30年。30年中,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几位中青年才俊,或在这一年,或在这之后不久,陆续步入图书馆学的殿堂。虽然这些进步不能说就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研究无疑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成果是新时期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记录。也许有人会质疑,那些注重思辨考证的“纯粹”的研究有什么用呢?胡适当年就曾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考证古籍版本、研究藏书目录有什么用呢?这些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却

繁荣了学术文化。考证古籍版本,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思想;探讨藏书目录,有利于了解各时代藏书情形,也对今天的藏书建设有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从藏书、目录、版本等研究出发,还可以推荐图书、指导阅读。这几位中有不少致力于这种研究,也有不少还在致力于这种实践。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献信息资源的管理,更应当探讨如何让这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尤其是目录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它教给人们的便是学会如何在浩瀚的文献知识和信息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本领,拥有这种本领和能力将会终身受用无穷。如果读者能从图书馆了解到怎样读书、有哪些书可读、书以哪种版本为好、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哪些书需要精读、哪些书只需浏览,这样,可以说图书馆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中充分发挥了文化教育的功能,也可以说我们的文献学、目录学研究并非全然虚不可用。文献目录之学本来就是致用之学,而其所致之用,应该说正是这些方面。

这些中青年学者是正在成长中的大树。他们潜心钻研,开拓创新,吸取养分,并逐渐枝繁叶茂。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图书馆事业这片沃土,而图书馆事业也因他们的研究而变得生机勃勃。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终将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顶梁柱。是为序。

彭斐章

2008年2月于珞珈山

序

我与世伟相识二十余年。从他就学于华东师大到担任上海图书馆领导,虽非朝夕相处,但也不时看到他在各种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又时有信函往来和在某些学术活动中晤面,自以为对他的学术历程粗有了解,不意最近看到他的论著目录,他从1984年至今二十多年间,竟然有论文百余篇和专著十六种,使我非常惊讶,因为他不是专一的教学和科研人员,而是一位长时间承担相当繁重公务的人员,这些成果都是在公余获得的。这不能不引动我对这一现象的思考。而其时,他应“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编委会之约,编选自己的文集,并请序于予。我借此略抒个人思考所得,以就正于世伟及诸贤达。

师承为治学根本。历来学者无不自有师承,接受名师的严格基础教育,然后方能逐步进益,学有所成。世伟青年时代受业于陈誉教授。陈誉教授学贯中西,著述闳富,极重师道,诲人不倦,是以世伟于大学阶段即已立学术根基。嗣后,世伟师从顾廷龙先生。顾先生为海内图书馆界耆宿,致力于版本目录之学,时称版本目录学大师,为学林所宗仰。世伟服务上海图书馆多年,得亲炙顾门,学业猛进,学术研究更趋成熟。

勤奋为治学要途。立足于勤,为学者获取成果的主要途径。焚膏继晷,古有名训。梁人阮孝绪于《七录》序中有云:“晨光才启,绡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阮孝绪正以这种勤奋精神,完成了目录学名著《七录》的编纂。今世伟昕夕从公,而能有多量成果,设非宵旰致力,曷得如此收获?

专一为治学方略。昔人有“专攻一经”之说,示后学勿旁骛之意。今世伟自就学至工作,倾全力于图书文献之学,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其专一之功,颇见成效。观世伟之著述目录,所录于

学有版本、校勘、考证诸方面；于人有向歆父子、孙诒让、王重民、潘景郑及顾廷龙等先贤之成就，皆不出图书文献之范围，可称专心致志。

清代藏书家张金吾于《爱日精庐藏书志》序中曾云：“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可见藏书于治学之重大关联。一般读书人往往以藏书不足，奔走搜求为苦。而上海图书馆馆藏之富，居全国之前列。世伟既一禀师承，复勤奋专一，又任职上海图书馆多年，坐拥书城，取用方便，左翻右检，得心应手，更为世伟添翼，此又世伟优于一般读书人之幸也。世伟治学有成，良有以也。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策划出版《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世伟膺选第二辑，乃就所著遴选二十余篇，成二十余万字之文集。优中选优，自见精彩。世伟方当盛年，前途大有可为，行见佳篇华章，层见叠出，为个人树里程，为图苑添异彩。我虽衰朽暮年，亦企望其更登层楼，精进不已。是为之序！

来新夏

二〇〇七年国庆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目

录

书版黑口说略	(1)
论孙诒让校勘的特点和方法	(5)
孙诒让《札迻》之校勘学研究	(16)
岳氏《九经三传》与岳珂无涉	(30)
刘向、刘歆父子校勘学初探	(32)
《墨子间诂》校勘述略	(40)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年鉴编纂出版论	(53)
《说文解字诂林》述略	(76)
政书初探	(84)
历代书目中谱牒文献的记载及其演变	(98)
合众图书馆创始考略	(108)
常熟翁氏家族及其世藏古籍善本	(121)
中文古籍著录中的繁体字、简体字与异体字问题	(135)
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尺牍文献	(142)
东瀛学术访问札记	(157)
传世孤本南宋明州刻本《集韵》初探	(164)
论四库标注之业	(171)
明清抄校本三种考述	(177)
上海图书馆藏王重民先生手稿提要	(187)
潘景郑先生之读书与校书生涯	(197)
论顾廷龙先生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206)
论顾廷龙先生的护书精神	(219)
顾廷龙先生之《集韵》研究	(228)
古籍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236)
《周礼正义》校勘述略	(254)
主要论著目录	(267)

书版黑口说略

黑口为版式之一重要内容,研究它的源流变化及其特征,对于鉴别版本乃至校勘、目录及书史之研究,不无益处。

一、黑口之界说

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云:“黑口大小者,版心上下刻一直线,上在鱼尾上,下在鱼尾下,粗者填满版心,是谓大黑口;小者刻一微线,是谓小黑口,盖所以表识版之中心,以便折叠时有准绳也。无此线者,则为白口。鱼尾之黑口亦因之。亦偶有两歧者。”

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谈》谓:“鱼尾上下到版匡为止,这空格叫做象鼻。象鼻空白叫做白口;有一细黑线的叫做细黑口,或小黑口;黑线粗的叫大黑口,或宽黑口;黑线特别粗的叫阔黑口。”

叶、毛二说,对黑口之定义清晰明了,可以使我们明白以下几点:(1)黑口的位置在版匡的象鼻处。(2)以黑线之粗细分为小黑口(细黑口)、大黑口(宽黑口)、阔黑口三种。(3)黑口的作用在表识版之中心,为折叠之准绳。(4)黑口白口或有两歧的情况。

二、黑口之滥觞

书版的格式同书籍的装帧形式是互相紧密联系的,我国古代的书籍经历了简策、卷轴和册叶三大形态。唐之前,古书或以简帛,或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即所谓书册。经过经折装和龙鳞装的过渡,大约到了五代,便开始采用蝴蝶装。“蝴蝶装者,不用线钉,但以糊贴书背,夹以坚硬护面,以板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见《书林清话》)。到了宋代后期,书籍开始向包背装演变,包背装即蝴蝶装之变形,其特点是版心向外。因此客观上

提出了版心的美观和整齐的要求。故下逮南宋后期,便出现了细黑口,“盖所以表识版之中心,以便折叠时有准绳也”。

据《中国版刻图录》所载,至南宋后期,已出现了细黑口的版本。如:

- 1.《营造法式》宋刻元修本 苏州 南宋后期平江府官版
- 2.《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宋淳祐十年上饶郡学刻本
- 3.《莆阳居士蔡文公集》宋刻本 江西地区
- 4.《后汉书注》宋王叔边刻本 建阳
- 5.《杜工部草堂诗笺》宋刻本 建阳
- 6.《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宋绍兴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刻本 建阳
- 7.《礼记注》宋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 建阳
- 8.《史记集传索隐正义》宋黄善夫家塾刻本 建阳
- 9.《后汉书注》宋黄善夫家塾刻本 建阳
- 10.《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 建阳
- 11.《汉书注》宋刘元起家塾刻本 建阳
- 12.《汉书集注》宋蔡琪家塾刻本 建阳
- 13.《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毛诗》南宋中叶 建本
- 14.《三国志注》南宋中叶建本
- 15.《唐宋白孔六帖》南宋中叶建阳坊本
- 16.《类说》南宋中叶建本
- 17.《挥麈录》宋龙山书堂刻本 建阳
- 18.《老子道德章句》宋虞氏家塾刻本 建阳
- 19.《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建阳
- 20.《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诗集》庆元年间魏仲举家塾刻本 建阳
- 21.《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 建阳
- 22.《群经音辨》汀州宁化县学刻本 宁化
- 23.《九章算经》嘉定六年鲍澣之刻本 长汀
- 24.《周髀算经》嘉定六年鲍澣之刻本 长汀

- 25.《孙子算经》嘉定六年鲍浣之刻本
- 26.《数术记遗》嘉定六年鲍浣之刻本 长汀
- 27.《五曹算经》嘉定六年鲍浣之刻本 长汀
- 28.《张丘建算经》嘉定六年鲍浣之刻本 长汀
- 29.《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 广州

以上所举二十九种宋版，均著录为细黑口。据上可见：(1)细黑口在南宋中叶开始出现。(2)这种形式比较集中于某一地区或某个私家刻本。如上所列举书中，建阳地区占了十八种。又，长汀鲍刻古算经六种均为细黑口。

元和江标所辑《宋元行格表》，汇集诸家簿录，备列宋元版本之行格，以资考索。其体例始自四行，终于二十行，各行内书以四部序列。内中宋本标有黑口者二十五种，然多录自他书，未曾经眼，且注录简略，不甚可靠。

《盩山书影》宋本第一辑中有原为白口，后经元明补版而为黑口者。如：

《仪礼经传道释集解集注》《附释音春秋左传经疏》

《新编古今事文类前集、后集、续集、别集、新集》

此为宋版书黑口版式之复例。

总之，宋版以白口居多。《中国版刻图录》所载宋版书一百九十种，黑口者仅二十九种，且均见于南宋中叶之后。

3

三、元版黑口之特征

元承宋制，元初，书籍版式多因袭南宋，或为白口，或为细黑口。如：临汾地区所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尚书注疏》均为白口，元大德年间所刻《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则为细黑口。黑口作为元版的一个重要标志，逐渐取代了白口的地位。《中国版刻图录》所列元版书共六十种，白口仅占十五种。

《仪顾堂题跋》中提及弘治东坡七集，为明黑口本，前有成化四年李绍序，尚存元版旧式。而书贾往往拆去李序，以充元刻，这从反面说明了元代书籍盛行黑口。

杨守敬所著《藏书绝句》咏“黑口本”曰：“鱼尾精镌黑口匀，宋鐫元仿多增新。六书七集三家传，并与荆溪一例珍。”

元代版刻黑口中有大小之别,表现在官刻多小黑口,坊刻多大黑口。如:泰定元年西湖书院刊《文献通考》、至正十四年嘉兴路儒学刻《大戴礼记注》均为细黑口;至正年间余志安勤有堂刻《古文唐律疏议》、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新刊王氏脉经》均为大黑口。此为通例。元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所刻《诗外传》、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学所刻《汉书注》均为大黑口;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张宅晦明轩刻本《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均为细黑口。此为变例。

江标《宋元行格表》中元本著录黑口者有四十三种,其通例变例均如上。

四、黑口之余波

仅黑口而论,明初版式同元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版刻图录》所载明本一百种,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至成化二十年张习刻本《雁门集》均为黑口。下逮弘治,间出白口,如弘治十四年江阴涂祯刻本《盐铁论》。此后,白口黑口已无规律可循。这从两点可以看出:

(1)同一地区所刻之书,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以建阳为例,明万历二十八年乔山堂刘龙所刻《新编图注伤寒治人指掌》为白口;明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刘洪慎独斋刻《文献通考》为细黑口,明宣德六年清红书堂刻《广韵》为黑口。

(2)同一时期所刻之书,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以正德年间为例,《正德琼台志》为黑口,《白乐天文集》为白口。

《书林清话》谓:“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多从宋本翻雕,故尚白口。”言简意赅,所言甚是,可视为版式黑口之总结。

原载于《图书馆学研究》,1984年第2期

论孙诒让校勘的特点和方法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廬居士,浙江瑞安人,是清末著名的校勘学家,一生校理古籍不下百种。其《周礼正义》被誉为“清代新疏之冠”^①,其《墨子间诂》被誉为“自有《墨子》以来未有之书”。^②其《札迻》被认为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相类,而过于俞樾的《诸子平议》,^③其他如《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契文举例》、《籀廬述林》、《籀廬遗文》、《温州经籍志》等,都各有成就,影响深远。俞樾在《迻序》中对孙诒让的校勘作过这样的描述和评价:“每下一说,辄使前后文皆怡然理顺。阮文达序王伯申先生的《经义述闻》云:‘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今得明矣。’仲容所为《札迻》大率如此,然则书之受益于仲容亦自不浅矣。”孙诒让在校勘上所取得的成就,几乎达到了“庖丁解牛”的境界,以至与孙诒让在经学上派别不一的康有为也认为:“先生于礼学至博,独步海内,与吾虽有今古文之殊,然不能不叹服之。”^④生活在清代考据学日趋没落时的孙诒让之所以能够成为乾嘉学派的有力后殿,使清学在日薄西山之机回光返照,这同孙诒让所处的治学环境及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

一、孙诒让校勘的特点

(一) 家庭与交游

孙诒让出生在一个官僚兼学者的家庭,其父孙衣言,曾官江宁布政使,并受聘掌教杭州紫阳书院,当时与孙衣言来往的均是著名的学者,孙诒让因此而有机会认识了许多学者并与他们共同讨论学问。曾国藩在江宁开设金陵书局,一时大江南北方闻之士云集于是,而孙诒让适从其父客居江宁,“是时德清戴望、海宁唐

／
／历史文献研究／
／

6

仁寿、仪征刘寿曾皆治朴学，先生与游，学益进”。^⑤这时《论语正义》的作者刘恭冕正在金陵书局刊补《论语正义》，孙氏与之时相过从，商讨经义。在金石文字方面，孙诒让与戴望、潘祖荫、江标、盛伯熙以及同邑黄仲弢都很有研究，“每有雅集，辄出所藏金文，辨证难字”。除以上提及者外，孙诒让交游较密者尚有谭献、王棻、张文虎、杜文灿、黄绍箕、翁同龢、缪荃孙、王懿荣、陈澧以及父执俞樾等，交游十分广泛。孙诒让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取长补短，博采众说。这是孙在校勘上得以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如《墨子间诂》，在不少地方采用了乡戚黄绍箕的观点。

（二）永嘉学术

现代学者钱基博在谈到孙诒让学术渊源时曾指出“其学渊源家学而远承宋学之永嘉经制一派”^⑥。永嘉学术以叶适、陈亮、吕东莱为代表，^⑦其学兼采朱学、陆学之长，以融合经义治道，经世治用为其宗旨。孙衣言以振兴永嘉学派自任，故于乡邦先哲遗著，或访购，或借抄，或辑佚，或校勘，或刊刻，真是不遗余力。孙衣言主持校刻的《永嘉丛书》共搜集了乡邦先哲遗文十三种，校勘之役多委由孙诒让担任。父亲的提倡，环境的影响，加上自己的研读，使永嘉学术对孙诒让产生了重大影响。1872年，孙诒让在代其家大人所作《良斋浪语集跋》中云：“乾嘉以来，巨儒辈出，而性理经术各守其家法，不相假借，汉宋之间盖断断如也。（衣言）曩在京师与方闻之士论当时门户之弊，常以为欲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者，莫如从永嘉之学。”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孙诒让自述治学旨趣。就在那年，孙诒让开始撰写他毕生的力作《周礼正义》。在当时海疆多故，世变日亟的历史背景下，孙诒让潜心研究《周礼》、《墨子》，联系到他起草《兴儒会章程》二十一条，提出《变法平议》的救世纲领，很明显，孙诒让校勘整理古籍同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主张是有紧密联系的。

（三）玉海楼藏书

孙氏玉海楼与宁波范氏天一阁、南浔刘氏嘉业堂，为晚清浙江著名的三大藏书楼。孙氏玉海楼创自孙衣言，然其先世已有诒善堂旧藏。孙衣言初官翰林时，稍益购书，“十余年间，致书约八、九万卷”。玉海楼是孙衣言和孙诒让父子两世聚书之处，其

藏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多稿本抄本,二是多名家批校本,三是多乡邦先哲遗著。另外,孙诒让还从文澜阁及钱塘丁丙嘉惠堂、仁和朱修伯结一庐等处借书传抄勘校。这些丰富的家藏,为孙诒让的校勘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玉海楼所藏孙氏手校本,现多归杭州大学。根据《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统计,其中经孙诒让批校、题识、序跋、过录或写有浮签的古籍共84种,均为玉海楼旧藏,而孙诒让自己的著述,又丰富了玉海楼藏书)。

(四)学术师承

中国古代学术特别讲求师承家法。从孙诒让的治学特点及其著述中,也可以找到他学术师承的轨迹。孙诒让在《札迻序》中谈到:“成丰丁巳间,年八、九岁,……一时甫受《四子书》,略识文义。庋阁有明人所刻《汉魏丛书》,爱其多古册,辄窃观之,虽不能解,然浏览篇目自以为乐也。年十六、七,读江子屏《汉学师承记》……,始窃国朝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四子书》均为经部之书,《汉魏丛书》也多为经子之属,孙诒让一生于经子用力最勤,恐怕与他少年时期阅书有关。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汉学偏重于名物训诂,与宋学偏重于心性理气自然不同,而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显然与汉学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小就受到汉学熏陶的孙诒让自然就师承于乾嘉诸儒。孙诒让在学术上最服膺的正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孙氏交游中,像戴望、唐仁寿、刘寿曾等皆治汉学,特别是俞樾,对孙诒让的影响很大,孙氏的重要著作如《墨子间诂》、《札迻》均请俞樾作序,足见两人之交厚,而俞樾的治经方法,同王氏父子如出一辙。章炳麟在谈到孙诒让师承家法时认为:“诒让学术,盖龙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⑧金榜同戴震均曾受学于江声,而段玉裁、王念孙又均出戴震门下。今人胡朴安对戴、王、俞、孙的学术师承源流作了如下的概括:“清代朴学,始于吾皖戴氏东原,传之江苏高邮王氏念孙父子,流风所播,至于浙江德清俞氏曲园、瑞安孙氏仲容,皆为皖学之一脉,至余杭章太炎,遂结此派学术之终。”^⑨孙诒让集乾嘉诸大师之长,又吸收了永嘉学术的优点,使他同段、王一起,居于清代学术之巅。

（五）考证派的校勘

张之洞《书目答问》曾列清代校勘家三十一人，如果将他们互相比较的话，即可发现他们各自的特点，以孙诒让与之比较，也同异互见。由于古代的藏书家往往都是校勘家，所以对藏书家派别的划分往往具有校勘家派别划分的性质。明胡应麟曾把藏书家列为好事家和赏鉴家，^⑩后洪亮吉广其义，别藏书家为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等，^⑪缪荃孙又承胡应麟之说，约分为赏鉴家和收藏家两派。^⑫叶德辉则认为“考订校雠，是一是二，而可统名之著述家，若专以刻书为事，则当云校勘家”。^⑬今人张舜徽先生则把校勘分为读书家之校勘和赏鉴家之校勘。^⑭综而论之，则叶、张二说为上，吴晗就曾认为叶氏之论“其见甚卓”。^⑮然命名未安，且没有详述。我认为将校勘家分为“版本派”和“考证派”较为贴切。

8

“版本派”的校勘家当以黄尧圃、顾广圻、卢文弨为其代表。版本派的校勘，其目的主要是求古求真，以功利言，则是为了赏鉴与刻书，所以重在求版本源流异同，故多用对校和他校之法。同时，他们整理古籍的初步工作，又为考证派的校勘提供了善本。如孙诒让校《周礼》，曾用黄尧圃《重雕嘉靖本校宋周礼札记》，校《墨子》，曾用顾广圻校《道藏》本。

考证派的校勘，当以王念孙、段玉裁、钱大昕为其代表。与版本派不同，考证派的校勘不是注重书籍的外在形式，而是注重书籍的文字内容，不是仅仅罗列众本异文，而是注重考证异文缘由。他们校书后所写的校记，是推究“作者之旨意”，多为读书的心得体会。这一派校勘家多用本校和理校之法。孙诒让在《札迻序》中谈到了他的治学甘苦：“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诵。遇有钩棘难通者，疑悟累积，辄郁轡不怡，或穷思博讨，不见端倪，偶涉它编，乃获墙证，旷然昭寤，宿疑冰释，则又欣然独笑，若涉穷山榛莽霾塞，忽覩微径，竟达康庄。”这种治学的甘苦和读书的境界，具有考证派校勘的特点。可见，版本派与考证派在校勘的目的和方法上都是有所不同的。如果用一个字来表示两派的区别，则版本派是据“本”而校，考证派是据“理”而校。正如版本派的内部互相之间同中有异一样，考证派内部也是如此。如孙诒让同王念孙在